

# 她和鲁迅文物打了六十多年交道

叶淑穗是北京鲁迅博物馆(下文简称“鲁博”)建馆时期的亲历者,此后从1956年到鲁博从事文物工作,她在那儿一干就是36年,几乎经眼了鲁迅的所有文物。

初夏的一天,在丰台区一处寓所,记者见到了91岁的叶淑穗,她记忆力惊人,交谈中对鲁迅手稿陆续发现、保存细节、递藏始末等等,如数家珍。

## 鲁迅作品与文物的“活字典”

1956年,叶淑穗从部队转业,到正在筹建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。叶淑穗印象很深,博物馆初建,馆里只有11个人。最初她分到陈列室工作,除了负责组织、布置展览,还要管卫生、管清洁,甚至管讲解。后来文物资料室负责人许羨苏看她工作认真细致,就把她调到文物资料室,做文物保管工作。

在叶淑穗的记忆里,“在最困难的年代,国家对鲁迅文物的保护也给了极高的重视。”刚开始文物库房条件简陋,但在当时已经算讲究的,库房是专门盖的,窗户都做了防盗设施。

但因库房盖的是平顶,一下雨就漏。上报文物局,局里批准改建。“这样,我们前后共建了四个文物库房。”叶淑穗说,当时盖库房就考虑到了防水、防虫、防盗、防尘、防火,甚至还考虑到要防原子弹,专门把一个库房建到了地下。

在鲁博的众多文物中,纸张是最难保护的,如何解决纸张潮湿发霉的问题,大家一直很头疼。从中央到馆

里,也很重视这个问题。叶淑穗说她们当时从故宫调来一批楠木和樟木,比着文物的大小量好尺寸,到前门去找老师傅定做了楠木盒,盒的里面是樟木,这样又防潮又防虫。按文物的尺寸做盒子,摆放得很整齐、很讲究,“领导来看了都很赞赏,中央档案馆的人也来参观,很欣赏我们这种樟木和楠木做的盒子。直到现在,馆里都用这些盒子装鲁迅手稿。”

为了保管好鲁迅文物,叶淑穗不仅通读了鲁迅全集,还把资料室收藏的众多鲁迅藏书、手稿和各式文物,全都记在脑子里,渐渐成了鲁迅作品与文物的“活字典”。有一次,叶淑穗负责讲解,给鲁迅好友、翻译家曹清华留下深刻印象。后来,曹清华一有问题就打电话问她,她很快就能做出准确的回答。

每当发现了新材料,叶淑穗也会主动提供给专家、学者做研究,可她总是谦虚地说自己的方法很“笨”,都靠手抄、靠脑子记。在鲁博研究员萧振鸣看来,现在不可能有像叶淑穗先生这样的人了,“她和鲁迅文物打了60多年交道,可以说毕生就做了保管并研究鲁迅文物这一件事。直到现在,馆里的年轻人遇到不清楚的问题,还会给她打电话。”

## 和许广平、周海婴交往颇深

叶淑穗坦言,那时候她既管文物,又征集文物,跟鲁迅同时代的人建立了联系。

还是在鲁博开馆前,有一次叶淑

穗跟着许羨苏去许广平当时在北海公园旁边的住所。许先生自己搬出一个大箱子,将手稿一件件交给她们,并对每件手稿的经历做了详尽介绍。

许先生在介绍一页《表》的译稿时,向她们讲了当年萧红、萧军意外发现这个鲁迅手稿的故事:当时二萧上街买油条,小贩将油条包好递到他们手中时,意外发现那张包油条的纸竟是一页鲁迅手稿!他们惊喜地写信给鲁迅并将手稿送还。“许先生还指给我们看手稿上残留着的几块油渍。那天,许先生还讲了很多鲁迅生前如何不在意自己手稿的事情。许先生回忆说,很多手稿都是她背着鲁迅偷偷收起来的,有的甚至是从厕所里发现后藏起来的。”

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,叶淑穗也是广东番禺人,她以前经常去许广平家里,有时候许广平还跟她说广东话,在感情上有一种亲近。叶淑穗还记得许先生向她谈起过,在鲁迅逝世以后,她和海婴搬到上海霞飞坊64号,她们母子俩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当时为保护大批鲁迅遗物,可谓吃尽了苦头。

让叶淑穗感佩的是,许广平将所有鲁迅文物都上交给了国家。“交文物的过程都很简单,她有时候打电话说,我这儿又发现了鲁迅的手稿,你们快来拿。我们就去了,像《鲁迅日记》等,那么有价值,就是这样拿回来的,没有任何仪式。”

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对叶淑穗也十分信任,两人经常交谈。在周海婴那里,叶淑穗既是“秘书”,也是朋友。遇到一些不好处理的信件,他便交给叶淑穗处理,有些人事信息需要问清楚,就打电话给叶淑穗,请她帮忙查找信息。许广平去世后,有时候家里的事弄不清,他便直接问叶淑穗:“我妈妈怎么说的?”

叶淑穗和鲁迅三弟周建人也有联络,并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。20世纪80年代初,周建人的女儿周晔整理周建人的口述《鲁迅故家的败落》,手稿最初写得比较乱,需要找人誊抄,周晔找到叶淑穗,叶淑穗自己忙,就让爱人帮她抄了一份字迹清楚工整的书稿。周晔特别感动,送了叶淑穗好几斤毛线作为谢礼,叶淑穗婉言谢绝了。

## 对鲁迅史料的讹误提出意见

很长一段时间,鲁迅手稿研究在业界热度很高,不仅学术界、博物馆关注,出版社也不断出版新书。但是一篇关于《新青年》的手稿,一些同志认为是鲁迅手稿,但上面的笔迹叶淑穗直觉和鲁迅的笔迹“有点不像”。虽然查遍了有关资料还找不到根据,她仍然坚持自己的疑问。

当时很多人笑她,让她别说了,“1958年就定了是鲁迅手稿,百分之百就是鲁迅的。”她感到委屈,回家后也很难过。那时候她的丈夫痴迷篆刻,对文字很敏锐,他看了也觉得不像鲁迅笔迹,便安慰她:“他们不信,咱们就用笨办法,一个一个查。”夫妻俩查遍了当时《新青年》几位编委的手迹,又把这篇《新青年》手稿中的字与其相对照,全都找出来复印,生生把一台复印机都“印”坏了。

在逐一比对中,他们感到那手稿上的字与胡适的笔迹最相近。为慎重起见,他们又把胡适不同文本上的同一个字放大之后打印出来,再仔细看,写法一样!拿出这样有说服力的比对,很多人便无话可说了。得到确认,夫妻俩感到很欣慰。

叶淑穗为人、做学问始终坚持实事求是,她研究工作的重点方向是鲁迅手稿的阐释、解读,经常对鲁迅史料的讹误提出意见。她抽出一本精美的、影响力很大的书,书里夹着很多小纸条,她说那是她看书时做的勘误标记。“我觉得出版社应该以内容严谨为第一,而不是说把书印得多漂亮,像这里头一共有二百多处错误。有些是写错了,比如最早把《阿Q正传》介绍到苏联的是王希礼,这里面写的却是曹清华。还有些地方不是把年代弄错了,就是弄颠倒了。”而最令她痛心的是,有些书直接面对学生,“只要看到这样的情况,我就要说。”

叶淑穗担心,当没什么人再能说起当年那些不寻常的岁月,历史会渐渐被人们遗忘。她觉得自己接触了这么多事情,可以写更多的文章,“要说有什么遗憾,其实对于研究这块我是很遗憾的。我希望能尽力整理出更多不为人知的史料,给鲁迅研究界,给读者留一些东西,这是我的责任,也以此认为不虚度此生。” 据《老年文汇报》

## 周信芳拍戏为求真骑马上舞台

1920年,京剧“麒派”艺术创始人周信芳作为青年京剧演员被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选中,拍摄戏曲片《琵琶记》。其中一折戏是“南浦送别”,讲的是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两个月,其父便催促他进京赴试,分别时,蔡伯喈骑马缓行,赵五娘在后殷殷相送。

当时的影视拍摄和制作技术不够先进,无法配音、配乐,主要通过演员大幅度的肢体动作和丰富的面部表情让观众感知角色。在整个剧组准备充分的情况下,前半部分的拍摄十分顺利,可拍到“蔡伯喈骑马缓行”时,扮演蔡伯喈的周信芳竟然骑着一匹真马晃悠悠地上了舞台,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吓到了,不知如何继续,导演杨小仲

只能喊停。

周信芳飞身下马,问导演杨小仲为什么喊停。杨小仲说:“这是演戏,你怎么骑着真马上台了?万一出了意外,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?”周信芳虽然知道导演是为自己好、为拍摄工作好,但还是十分严肃地说:“能用真马却不用,这就是在造假,这是对观众的不尊重,是对电影行业的不尊重,更是演员对自己的不尊重。”

看着周信芳坚定的眼神,杨小仲被周信芳的艺术追求打动了,允许他骑着真马完成了“南浦送别”的拍摄。而事实证明,这匹马的确为该片增色不少,电影在上海和北京放映后,受到了观众的赞赏。

据《文史博览》张彦民/文